

科学认识与精准把握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张艳涛 钟文静

提 要：科学判定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是制定正确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前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科学判断，符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是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的创造性应用。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事业。

关键词：习近平 新时代 主要矛盾 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张艳涛，男，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文静，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这是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对主要矛盾表述的首次变化，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应用与发展，是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的科学判断，有利于准确定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利于继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习近平同志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符合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16BKS093）、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历史逻辑

经过长期努力，如今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和中华民族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认识与理论总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与时代主题和趋势相呼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成为人民的思想武器。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说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①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断与时俱进。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时期，首创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并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专门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斯大林最初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后来又过分夸大苏联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汲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深入调研和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认识。毛泽东首先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②

在这个重大理论判断的基础上，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至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在党内形成了高度共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来源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实践，具有独创性，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和人民意愿，提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③ 面临改革初期的一系列难题，党始终从国家利益和人民需要出发，寻求化解之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表述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④ 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有助于把握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性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正是在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将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有机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在这一阶段，发展生产力是解决各方面问题的基础性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基于此，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改革开放持续深化，不断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在每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则是对阶段性特征的深刻反映。习近平同志立足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从整体和全局角度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进而面向矛盾和问题，变阻力为动力，发展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① 新时代的来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起点。“发展起来之后”的阶段，问题会更多。当前，要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和阶段性特征。

第一，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一方面，人民需要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发展进程，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人民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目标，这是从人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价值判断，强调的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对人民需要的关注从主体角度实现了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和人民需要增长的共同结果。生产力的进步促使人民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不断提升，也推动着人民的需要不断优化和升级。同时，人民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也是实现自身发展、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人民满足自己需要的活动推动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使中国逐步走向富强之路。当前，我国社会生产能力在某些方面已经步入世界前列，如何使“站起来”和“富起来”的中国更有能力使人民有更多获得感，逐渐“强起来”成为现实任务。

第二，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既是对社会现实的整体把握，又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新时代的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生产的落后状态，这是对我国发展总体趋势的客观描述，但与此同时，将关注点转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则凸显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实际上，不平衡的发展和不充分的发展是关于发展问题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复杂的结构状态，有多种表现形式：既表现为社会各要素在发展中不能相互协调、良性互动，也表现为社会各领域在产出方面量的比例失调，还表现为社会成员在分享建设成果中所得份额不合理。无论不平衡的发展表现为哪种形式，都影响到社会结构的稳定和谐，影响到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另一方面，不充分的发展是一种不足的量的积累状态，尽管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上突飞猛进，但还有很多具体方面存在短板，只有不断补短板，才能更大幅度地增加量的积累，进而实现质的飞跃。

“报告”中出现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小康社会”中使用的“基本”“总体”“不久”均是发展不充分的具体表现，也是党和人民的奋斗方向。

第三，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依然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我们的“最大实际”与“最大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这些“变”与“不变”进一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和治国理政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要求我们不得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现实”。习近平在“报告”中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①可见，我们党对于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既体现了一种历史的飞跃，也体现了历史的清醒和历史的担当。中国共产党人就要适时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发展战略的转移，与之相应，中国社会的战略部署也要相应调整，这就是我们的战略新判断。虽然不平衡不充分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特征，但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容忽视，探寻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刻不容缓，所以，党和国家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疑是明智的。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哲学基础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这一哲学基础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恩格斯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是基于中国当代发展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智慧结晶。

第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深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③。认识来源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认识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

当今中国的落后状况得以改变，社会生产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总体上得以解决，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主要障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时，我国虽然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取得很大进步，但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没有改变。例如，工业方面，国民经济体系发展到一定规模，但现代化水平不高；农业方面，农产品产量增长，但机械化覆盖面积不足；教育方面，建设步伐加快，但文盲率高。所以，当时摆在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努力增加社会财富，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经过长期努力，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才有了今天中国逐步发展壮大的局面。从“报告”可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产生了“历史性影响”。例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稳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中西部和农村教育明显加强。发展起来了的中国早已摘掉了贫穷的帽子，走向了富裕的道路，同样，人民的需要也不再停留于一般的物质文化层面，而是表现为一幅关于美好生活的整体蓝图，蕴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由此，今天的思想必须与时代特征相呼应，关于主要矛盾的新认识来源于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也将能动地作用于未来的实践，并在其中得到检验。

第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创造性应用了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是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发展规律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①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而社会主要矛盾是它在某一历史阶段具体形态的展开。新时代我国的建设与发展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和困难，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② 把握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其他矛盾便迎刃而解。

当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解决以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方面，发展不够平衡，还需不断调整。例如，民生领域有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等。另一方面，发展不够充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例如，发展质量和效益、创新能力、实体经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都需要不断提升。无论是调整、改革还是提升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谋划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依据。在深刻分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后，“报告”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③ 由此，指明了我国未来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改变了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状况，而继续深化改革，保障发展持续性，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同时，要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既需要逐一克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短板，又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更高的价值目标。

第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思想深入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④ 社会历史就其整体而言，是人类群体的实践和认识活动及其产物的不断演进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包含了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等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自觉将群众观点贯穿在工作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论断是对人民需要变化的敏锐把握，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贯彻，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是党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到：“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与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自觉认识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而且自觉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路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和关键时期制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都与党对国家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密不可分。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就抓住了重点，也就找到了工作的目标和方向。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而矛盾的解决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支撑。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报告”强调：“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②党的领导不仅仅是宏观层面和政治层面，而且要具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保证党在各个行业和领域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转变给党的领导提出新课题，进一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

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要求：“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③提升“四力”的根本在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核心在于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其一，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证明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而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了具体发展规划、发展策略、发展环节上尚存有隐患，因此，应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解决这些隐患。其二，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谋发展、补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修订颁布90余条党内法规，2018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及长期以来的反腐成果，早已使全面从严治党深入人心。其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提出与践行，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突出人民主体性地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蓄力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②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20、16页。

第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科学认识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回答。它内容丰富，“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①；既有战略意义又有具体部署，为全面有力地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行动方向。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突出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展开与实现，需要坚持推行“五大发展理念”，进而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动力之源。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报告”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建设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逐步显现，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全面发力，抓住问题的关键，突破难点，“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③，才能调动社会各领域和各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最大最广泛的动力，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当然，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具备明确的举措和目标。“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让发展更有质量，让治理更有水平，让人民更有获得感。”^④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经济、政治、法治、文化、民生、生态等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可以说具体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

总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的推动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面向问题，不断前行。

责任编辑：孙艳兰

^{①②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1、3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